

# 发展改革动态

2020年第5期 共114期

发展规划处

2020年5月15日

## 【聚焦“双一流”建设】

### 龙宝新：论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

**摘要：**在一流学科建设中，我国高校对西方名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坚持走中国特色学科建设之路，探索学科建设的中国经验、中国思维、中国道路，是导正我国一流学科建设航向的客观要求，是中国高校学科治理成功的标志。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旨归是助推我国学科建设迈向“三化”——自主化、本土化与国际化，努力开创出一条自主推进、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一流学科建设之道。该建设道路主要有四条具体路径：国家统领，走内生自主的建设之路；育人优先，走人才强学的长效之路；产学研融合，走创新创业的学科知识激活之路；整体推进，走综合、协调、可持续的学科系统建设之路。在新时代，发掘、坚守、弘扬这些“特色”是我国一流学科永葆本色、走出低谷、走向巅峰的国家方略。具体而言，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应转向“守中望西”的学科建设立场，设计“中体西用”的学科建设方案，促进世界一流学科公共核心指标的特化。

**关键词：**一流学科建设；中国特色；中体西用；学科立场；行动方略

学科是大学组织的单元与心脏，一流大学建设的内核是一流学科建设，探索出一条最适合国情的一流学科建设之路是中国高校学科治理成功的标志。其实，学科建设是条条大路通“一流”的，只要是合乎学科成长成熟规律——“扎根环境、自主成长、互动共生、协调发展”的道路都是合理之路、可行之路。我国学科建设者肩负的时代担当是：从多样化学科建设路线中遴选出一条合身之路、最优之路，借此构筑中国学科事业发展的高速公路。这就是学科建设中国化的实质与使命。在当前，我国对西方名校一流学科建设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仰望西方名流、遵循“世界标准”、学科自信不足成为阻碍我国高校一流学科建设

进程的绊脚石。在这一形势下，探索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国经验、中国思维、中国道路、中国标准就成为导正一流学科建设航向，坚持“中国本位”学科建设原则，培育一流学科建设中国特色的迫切要求。下文将对我国一流学科建设问题予以剖析，以期为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实践提供路径参考。

## 一、彰显中国特色：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三化”旨归

一流学科是“养”出来的还是“造”出来的，是自然“成长”起来的还是自觉“建设”起来的，是被市场、政客“逼”出来的还是学术、学者“育”出来的？对这些问题回答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国家、高校学科发展中产生“路径分叉”的节点所在。在实践中，不同国家、高校、学科面临的具体境遇不同，致使其选择的学科培育路径与建设模式互不相同，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确实不足为奇。应该说，中国语境是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模式选择中的首要参考变量，善于照应中国传统、中国社会、中国需要的一流学科建设路径才可能获致强劲的生命力与发展力。为此，坚持走中国特色学科建设之路是当代我国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正道，是助推我国一流学科步入世界前列的超车道。所谓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是指我国高校在学科自主、自信、自强理念的指引下，紧密结合中国学科成长的传统、环境、要求开展学科建设活动，奋力实现用中国特色“一流”理念来引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一流学科建设“中国特色”的核心内涵是立足中国具体国情，谋求学科自主自强，心系国家命运的学科立场、学科道路、学科追求。与之相应，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道路是：从自主自信的学科立场出发，积极探索适应本土的学科道路，铸就引领域外、走向世界的学科品质，进而促进我国学科建设“三化”目标——自主化、本土化与世界化的实现。

### （一）彰显中国特色是自主建设一流学科的要求

从学科立场上分析，“中国特色”意味着一流学科建设必须坚守学科自主的立场。一流学科概念诞生的原语境是各类学科间的同质化比较，将比较结果加以量化之后得出关于某一学科品质的判断就是“一流”的概念之源。无疑，这一“同质化”的参照系正是西方世界名校，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的学科建设标准。当代世界一流学科评价是西方一流学科话语体系、指标体系、价值系统、质量文化的折射或翻版，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学科在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和U. S. News世界大学专业排名中不占优势并被边缘化具有其必然性。在西方主导的格局中，中国学科“只能是处于由他人去解释的边缘位置”，这就是我国学科被边缘化、被世界挤压的真实写照。其实，各国一流学科间既有量的差异，更有质的差异，把一堆脱离学科生长环境的抽象指标拿出来作同质化比较的做法是危险的，它极有可能导致具体学科的发展悬空于社会文化环境之上，异化为与本土社会发展失去营养脐带关联的“怪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对我国学科产生“边缘危机意识”实属必然，而消解这一意识的学科拯救行动就是：捍卫中国本土学科的尊严，重树“中国学科主体意识”，坚持学科自主、自信、自强的建设理念，真正将凸显中国精神、中国气质、中国特色视为提振我国学者学科信念的有力举措。所谓学科主体意识，就是在学科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反省批判意识、责任意识、竞争发展意识等”。强化学科主体

意识、学科自立精神、学科自主立场是学科建设中国特色的首要内涵。中国高校的学科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出来的，天然携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发展环境的基因与痕迹，并存活在反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文化的链条上，它绝不可能和西方高校学科“长成一个模样”。正是如此，评判中国高校一流学科的首要标准是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与贡献率。而在这一点上，中国高校学科发展在世界上是引以为傲的：当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社会凝聚力飙升，中国高新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这些无疑得益于中国高校学科建设的成就与贡献。换个角度看，当前西方一流学科建设与评价尤为重视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声誉、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和引用等所谓的“硬”指标，其实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指标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它无法体现每个学科对本地域发展作出的特殊贡献。甚至可以说，此类评价是对异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高校学科的无形封杀或抑制，是对我国学科自主发展道路的一种挟制。我国学科发展如若过分笃信其效力，则可能会被误导走上一条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的“脱域”之路。中国高校在一流学科建设中首先要重树学科自信，坚守学科主体意识，自觉抵制西方学科评价的侵蚀与遏制，努力建设出具有中国底气、中国豪气的一流学科。为此，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一定要坚守学科自信与学科主体意识，致力探索出一条立足中国学科环境、守护中国学科尊严、坚持中国学科标准的独特建设道路。

## （二）彰显中国特色是一流学科建设扎根本土的要求

从学科建设路径上看，“中国特色”意味着要走“中国式”的学科建设之路。一流学科是“高水平学科”的代名词，但“高水平”一词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与公认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高水平学科一定有中国式的表达、中国式的内容、中国式的标准。中国一流学科是植根中国本土文化中生长起来的高水平学科，是在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成长起来的高品质学科，其内蕴的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智慧是无法从国外学科建设成果与经验中“进口”的。进言之，中国一流学科是栖息在中国本土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之中的，它只有继续从中摄取营养、汲取智慧才能让“一流学科之花”开得更艳，并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贡献特殊智慧与独特方案；否则，在建设路径上完全遵循国际标准，追随哈佛、牛津学科轨迹，照搬照抄英美建设方案，中国学科与世界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最终陷入“自我迷失”“离经叛道”的泥潭。应该说，每个学科都具有“国家+”的学科内涵——国家的精神、气质与希求融渗在整个学科机体与发展细节之中，并从深层决定着该学科发展的轨迹与命运。与之相应，中国一流学科一定是“中国式”的“一流”。“中国式”是“中国本土化”“中国境遇化”“中国特色化”的代名词，中国式一流学科一定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系统之中并与中国大学发展史无缝对接的学科，一定是与中国本土化学科发展要求唇齿相依的学科，一定是与中国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学科，一定是能够赢得中国人认可与信赖的学科。有学者指出，在“双一流”建设中“中国特色”的基本含义是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面向国家重大目标和重大战略等。这四个“特色”含义规定了中国一流学科的建设路径与行进主道。换个角度来看，尽管学科是学问、学术、学者的构成体，具有国际公约、人类共享、世界公认的共同属性，但个体性、学校性、

国家性同样是学科事物的根本属性。就其二者关系来看，共性是个性的抽象，个性是共性的表现，体现在一流学科建设上便是：每个一流学科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每个学科的“一流”都有其特质与表现，它们构成了一流学科量化等级式评价的禁区与极限。在当前一流学科建设中，我国如若笃信国际上流行的知名学科评价系统及其排行榜，势必会导致学科建设忽略国情特色、隔断本土营养输送，逐步走上同质化、西方化、去本国化的歧路，最终沦为西方学科“潜规则”的牺牲品。与之同时，我国学科建设也会忘掉初心与根本，迷失自我发展的方向，造成学科研究资源隐性流失，成为国人拒斥的对象。所以，从学科建设路径上看，一流学科建设“中国特色”的内涵是：用中国本土智慧解决中国学科难题，用中国本土方式展示中国顶端学科发展水平，用中国本土经验开拓中国学科发展的新疆界。

### （三）彰显中国特色是引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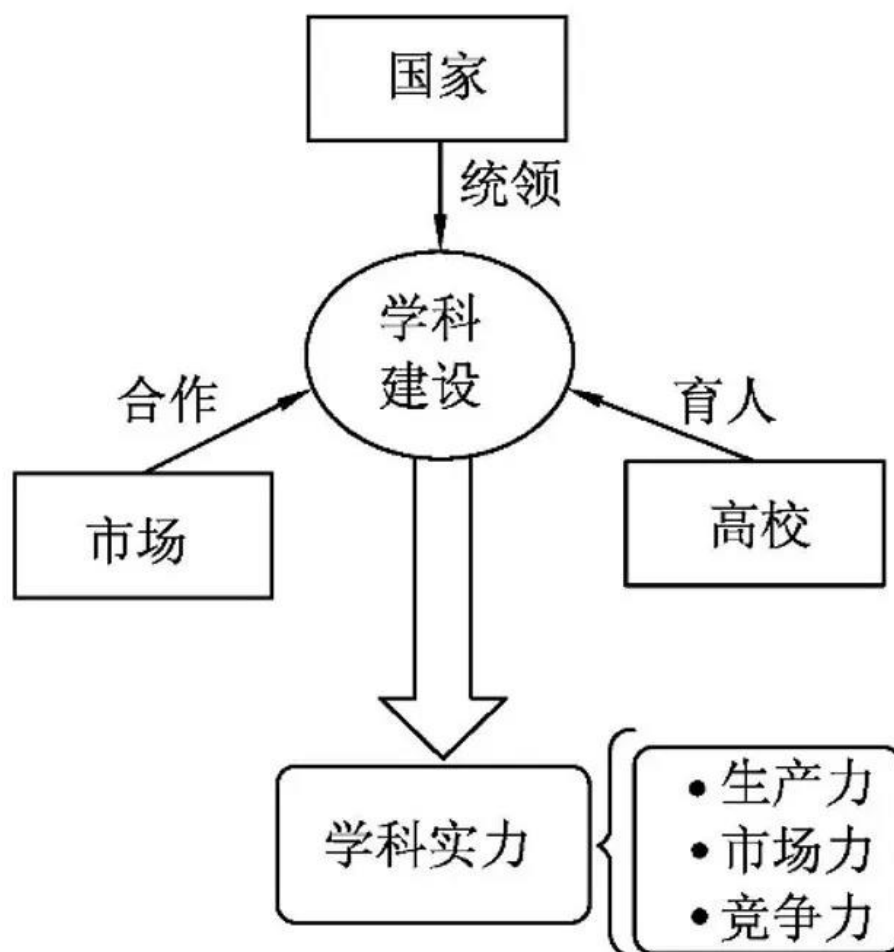
从学科建设目标上看，“中国特色”意味着用独特范式引领世界一流学科的主流与走向，让中国一流学科走向世界学科舞台的中央，逐步引领世界一流学科的话语体系与规则体系。与世界学科群落互联互通是中国本土学科发展的生命力之源，是中国一流学科在世界学科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基本条件。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在于：用中国化的学科建设思路、方式与理念达到世界一般学科建设所难以企及的高度与境界，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瞩目、效仿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一流学科建设经验是否可靠、有效、先进，需要世界学科建设实践的佐证，其效力最终取决于它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影响力、贡献力与领航力。真正的“特色”一定是有世界性影响的，而非孤芳自赏的玩物。与此同理，本土化的一流学科建设之路一定是“‘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道路，即从本土化到国际化、最终到全球化的过程”，是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化与世界化、特色化与通用化间的互变互化、持续升级之路。如若把学科建设视野一味局限在中国学科域内，而不考虑其对世界他国的辐射力，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则可能毫无国际生存空间；如若用国际学科建设思路来置换本土学科建设思路，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则可能落得被世界他国学科建设所殖民的败局；只有把中国学科建设水平提升到可以置换欧美所谓“国际标准”的境地，才算“中国特色”在世界范围内真正获得了认同。其实，英、美等西方少数国家一流学科建设的国别经验之所以会成为世界经验、世界范本、世界权威，其原因在于它已经初步完成了由本土化向国际化的升级之路。在一流学科建设的探索中，我国高校也应该主动借鉴这一升级路径，坚持走“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创造特色”之路，全力将中国本土一流学科建设模式升级为世界性的学科建设范本。只有怀揣这样的勇气与韬略，中国一流学科建设实践才可能悄然改变世界一流学科的话语系统与权力布局，为中国一流学科建设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一流”定义权、学科建设领导权与世界生存空间，让中国学科建设事业彻底实现从“被解释者”向“解释者”、“被执法者”向“立法者”的地位翻转，真正发生“从跟踪追赶向跨越引领的转变”。所以，我国一流学科建设要追求的一个至高目标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概念、范式、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任何有效解决了一个具体中国学科发展问题的学科建设经验表面上看是地地道道本土化的，但就其内蕴的学科思维方式、学科发展

理念、学科实践智慧而言，则具有较强的共通性、世界性，每个成功的中国学科方案、中国学科建设案例背后都涌动着世界性学科发展的贡献。一旦这些独创性的方案经验持续涌现、积累壮大、引发质变，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实践就极有可能撼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大厦，引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心东方化、中国化的剧变。

## 二、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的道路

所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的特质属性，是事物存在的独特性以及其与相似事物相比而言的差异性，“特色”导源自事物的存在使命与生存处境。我国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具有鲜明国情特点、文化特色的建设立场、思维与内容就是“中国特色”，发掘、坚守、弘扬这些“特色”是我国一流学科永葆本色、走出低谷、走向巅峰的国家方略。从宏观角度看，任何学科建设实践都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国家、高校与市场，三者间动态关联的方式就成为学科建设道路的另一种表达，评判该道路的效能标准是学科实力，即是否有利于学科实力持续、快速、正向地提升。就其内容而言，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道路的核心内容是以学科实力提升为核心，以国家统领、育人优先、产学研融合、整体推进为关键特征与基本要素，共促中国高校学科综合实力，即生产力、市场力与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见图1）。

图1 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道路的理论框架



进言之，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道路的独特性在于：坚持国家统领，高扬学科自觉、服务国家的主旋律；坚持育人优先，全面释放学科的育人功能；坚持产学研融合，推进学科实力向核心科技转化；坚持全面建设，确保学科在内部组织与外部关联中协调推进。

### （一）国家统领，走内生自主的建设之路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学科建设被认为是高校自己的事情，具有“灵活性的柔性”，美国国家教育部教育统计中心只负责编制学科专业分类目录（The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IP），其意图仅仅是“宏观调控、政策导向与信息服务”，学科建设几乎处在自在调控、自由生长的状态。而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直接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制定国家学科战略，主动打造学科高峰、开展国家学科评估、强力注资强势学科、引导“四新”学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这是国家在学科发展上高度自觉的体现，堪称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的催化剂。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我国上述做法无疑是及时而又合理的，是助推学科制度强制型变迁、加速高品质一流学科形成、促使学科建设事业在国际上后来居上的必要之举。国家统领的优势不仅在此，还在于它强化了一流学科建设的内生之路、特色之路与中国之路，有利于契合我国国情、传统、文化、需要的一流学科形成。有学者研究指出，学科治理是“培育作为学术原生力与整合力的学科群实现自我生长与交往共生的一种精神信仰”，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秉承的正是这一学科内生精神。《方案》明确指出，“加强系统谋划，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推进机制，坚持久久为功”是我国一流学科建设方案的出发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一流学科建设的总目标。再从具体模式来看，当代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有三大基本模式。一是金字塔模式，即行政驱动式，其做法是把全部学科分为三六九等，如高峰学科、高原学科、普通学科等，按照塔尖学科标准来引领整个国家学科群落的发展。二是自组织模式，认为学科是“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完全依靠学科与学科、环境间的自然互动机制来发展，体现为市场驱动式与学者驱动式。前者主要指学科与外部环境间形成的自组织系统，后者特指学科内部环境中形成的自组织系统。三是花园模式，即系统整合行政系统的学科设计力量、市场系统的学科选择力量与学者主体的自主发展力量，使之在相互制衡与互动关联中推进学科发展。显然，西方大都采用的是第二种模式，而目前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则倾向于第一种模式，这是由当前我国高校正处于学科发展期、突破期的特殊形势决定的，其内在妥当性毋庸置疑。在新时代，如何综合利用好国家的学科助推力、高校的学科协调力与学者的学科自治力，促使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理论日益清晰、成熟，是考验学科生产者与守护者——中国学者的一道难题。

### （二）育人优先，走人才强学的长效之路

从西方主流学科评价标准可以看出，西方一流学科建设中器重的是杰出人才、成功学者、高端成果、核心科技等硬指标的产出，器重的是学科建设的标志性业绩，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其内在缺陷是：上述硬指标的设计也出自西方学者之手，无法适应中国文化这一异质生态系统，这就决定了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必须另选思路、另辟蹊径。从《方案》可以看出，我国

一流学科建设的优先考虑是育人，即“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进言之，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动路径是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的高素质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使其肩负起创新科技、振兴产业、复兴民族的伟业。所以，筑就中国魂、培育爱国人才是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首要考虑，而在西方一流学科建设中则较少考虑学科人才的价值观与综合素养培养问题。人才，尤其是青年学者、青年大学生才是民族的希望，是学科建设的潜力股，强调育人优先意味着我国学科建设追求的是长效性，走上的是一条长远之路。在一流学科建设中，“中国特色”在学科育人实践中有三点体现。其一，优秀教师培养先于拔尖人才培养。

《方案》中将“建设一流师资队伍”视为一流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使之位居“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之前，其潜在原因一目了然：优秀教师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园丁”，是学科育人的中坚，无疑应该置于首位。其二，品德培养重于才学培养。我国一流学科要培养的创新人才必须是“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故学科建设中要“用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其三，文化自信教育先于创新创业文化培育。我国一流学科育人的关键内容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加重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教育，目的是让每一个学科建设的参与者都具有一颗“中国心”。人心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导航仪、聚能环与激发器，人心培育优先是中国特色的显著特征与优势所在，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之路始终强调育人先于育才、育德先于育知、育心先于育能，其优势在于能够凝聚中国人的学科建设热情，激发中国人的学科建设原创力，落实以“中国人”为本的学科建设原则，彰显育人在学科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与长远意义。

### **（三）产学研融合，走创新创业的学科知识激活之路**

我国一流学科成果主要有两大应用方向：一是育人，即学科建设与“双创”教育相结合，培育拔尖人才与高水平学习者；二是产业，即学科建设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以“四新”学科建设为抓手，利用学科成果孵化核心科技与高端技术企业，发挥学科作为产业发展引擎的功能，这就是产学研融合。当代世界经济竞争的焦点是高科技企业产业间的竞争，其实质是技术创新、行业创造的比拼。为此，学科建设只有发展成为国家创新创造的比较竞争力方能彰显其重要价值，中国一流学科建设也只有在聚焦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中催生“中国创造”“中国新农村”“健康中国”“中国话语”，才能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具体而言，在一流学科建设中，新工科建设应强调传统工业的智能化升级，构筑领跑全球工程教育的中国模式；新农科建设应强调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建设，助力中国乡村振兴与文明重建，提升农村生态成长力；新医科建设应积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医学”，让医学行业成为高科技集成性行业；新文科建设应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交叉融合，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培育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派。总而观之，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将一流学科建设与科技创业、产业链建设、新文化建设相结合，打通学科成果向产业、文化转化的壁垒，构筑学科建设成果转化的高速公路；其二是将一流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产业技术升级相结合，用学科创新带动企业创造、学者创业，与“双创”并驾齐驱，

促进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共生共赢的良性循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硅谷间的合作开启了产学研合作的崭新模式；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产业收入”被作为专项评价指标，以评判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间的融合度。显然，这些产学研互动模式具有明显的市场驱动性与自然合作性。相对而言，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强调产学研合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学科建设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主动融入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主战场中去，大力提高学科创新对中国社会转型、关键技术突破的贡献率，其国家民族色彩、社会责任意识、学科强国精神体现得尤其明显。应该说，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角度来审视学科建设与产业升级、文化更新的关系，来定位一流学科建设的功能与使命，是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思路的独特内蕴。正如有学者所言，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学科的落脚点就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需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

#### **（四）整体推进，走综合、协调、可持续的学科系统建设之路**

尽管当前中国高校学科实力相对薄弱，但面向未来释放学科建设潜能的条件——全面协调发展的布局已经具备，这是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道路的又一优势所在。学科是一个多维构成体、多功能综合体，而不单单是学科知识的聚合体、加工厂与学者集结点，“学科基本功能的履行依靠自身内部不同要素的协同和整合”，确保学科多维度、多功能协调发展是学科建设整体实力提升的必由之路。从《方案》可以看出，我国一流学科建设非常强调四个学科要素，即学科结构、学科水平、学科治理、学科环境的全面统筹与协调发展。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在学科结构上，强调国家宏观引导、学校自主优化，突出学科重点，凝练学科方向，有助于国家学科布局、学校学科规划的科学推进；在学科水平上，强调瞄准世界一流、打造学科高峰、培育特色优势，有助于国家学科实力的持续攀升；在学科治理上，强调学术基层组织建设与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有利于学者为本、民主开放、多元治理、依章运行的学术治理机制的形成；在学科环境建设上，强调学风建设、氛围营造、有序竞争，要求“保护创新、宽容失败”，有利于良好学术环境、学科生态的形成。因之，将一流学科发展视为一个“内部运动、内外互动、外部推动”的自主生命体，视为一个多要素网络化联动的学科有机体，是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道路的鲜亮特征。学科是“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一流学科是一个多功能的实体，所以，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必须按照“国家高校社会行业”联动协作、全方位支持的思路来推进，进而在一流学科建设这一“立交桥”上有效整合国家复兴战略、高校发展规划、社会进步要求与行业振兴计划，实现学科建设功能的最优化整合。

### **三、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动方略**

随着《方案》的颁布与实施，一流学科建设中国特色日渐清晰，我国学科建设事业步入了中国化的快车道。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我国学科建设事业还身陷西方化主导的一流学科建设话语系统重围之中，要披荆斩棘、冲破围剿，达成独占鳌头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在新时代，培育一流学科建设的中国特色将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时代主题与历史使命。



可以预见，扎扎实实地转变学科建设立场，融通中西方学科建设经验、推进世界一流学科核心评价指标的中国化将是现阶段巩固中国特色、力创“中国一流”的现实行动方略。

### （一）“守中望西”的学科建设立场转向

在《方案》出台之前，我国高校身陷种种世界一流学科国际标准的阴霾之中，悄然沦为西方主导的世界一流学科话语体系、评价体系的边缘，学科建设的中国立场、主体意识、本土关怀被弱化，一流学科建设陷入不自信、不自主、不自强的怪圈，甚至出现了试图通过国际大师招徕、国际论文发表、国际学科宣传等简单手段来解决中国学科发展瓶颈问题的现象。在国家统领、中国学者主导的一流学科建设中，我国高校必须坚守“中国特色”发展理念，深层矫治仰望西方、追随哈佛、膜拜牛津的异化学科立场，真正走向去西化、自主化的学科建设新立场——“守中”的立场。我国要建设的一流学科首先是中国式、中国本土的一流学科，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显赫、贡献非凡、特色鲜明的一流学科，其次才是走向世界、誉满全球的一流学科，没有国内学科声誉、学科绩效、学科贡献作内核，所谓的“一流学科”都只是徒具虚名或世界空名。只有扎根中华大地，面向民族复兴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一流学科才有资格跻身“世界一流”的行列；否则，这些学科都只不过是欧美一流学科的中国翻版而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看似华丽却不中用。在这一学科立场指引下，我国应该逐步树立用自己的特色评价标准、学科价值观、学科话语系统来审视、评判、言说西方一流学科的信心与立场，即所谓的“望西”。《方案》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为此，在中国特色评价标准与西方通用评价标准的关系处理上，我国一流学科建设评价应该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固本原则，即巩固中国学界公认评价指标的根本地位，如对学科的育人价值、国家贡献等指标应予以强化；二是中国化原则，即在引进国际评价指标时应该予以本土化调适，对那些西方特有的评价指标予以弱化或删除，对那些适合引进的评价标准予以中国化改造，如对“学术论文发表”标准的改进可以考虑突出“学科点代表性学术论文”的评价等；三是中国基点原则，即在学科国际化评价中强调站在中国学科发展基点上来设定指标，重点评价中国学科对国际优质学科辅助资源（如拔尖人才、学术平台、青年学者等）的吸引力。上述三条原则的确立为“守中望西”“服务中国”的学科建设思维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导。其实，眺望、欣赏、借鉴西方一流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而不被西方学科建设的价值标准、行动轨迹、思维方式所迷惑、所禁锢，正是保持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中国化定力、中国心内核、中国本体思维的直接体现。基于这一立场，我国高校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必须强化中国特色，突出中国文化历史优势，深掘中国学科建设经验，创新中国学科分类方式，凝练中国特色学科方向，逐步确立“以中释西”的学科自主意志、自信傲骨与自强精神。

### （二）“中体西用”的学科建设方案设计

在一流学科建设中，“中国特色”的培育要求我国高校积极研发学科建设的中国方案，突出学科建设的中国经验，在此原则下学习西方学科建设方案之长，汲取西方学科建设的优

质经验，致力形成“中体西用”的本土化学科建设方案。我国出台的《方案》是学科建设中国方案的一个范本。在落实该《方案》过程中，各地区、各高校要善于汲取该方案制定的精髓，真正将“中体西用”精神落实在一流学科建设的环节、细节中去。通过对《方案》作深入剖析可以发现，一份成功的学科建设中国方案一定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中国本土的学科建设内容与境遇诉求，包括价值理念、建设背景、建设意图等；二是世界学科建设的共同经验，如学术研究、成果转化、学科治理、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三是中西融通的节点设计，如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表达本土的学科立场，影响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方向等。为此，基于“中体西用”精神的一流学科建设中国方案应该从上述三个角度综合考虑，相关高校应积极响应国家学科建设要求，全力研发出符合本地区、本学校实际情况的具体建设方案，形成与本地区、本机构实情高度契合的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为了确保该方案顺利实行，我国一流学科建设者应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开展学科环境的 SWOT 分析，探明自身的学科基础、学科价值、外围形势、可能突破点，努力研制扎根本国大地的建设方案；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探察顶端学科发展状况，析取出学科核心指标提升方面的成功经验，将之融入自身建设方案之中；三是瞄准中西学科建设经验的交汇点，如学科国际交流平台利用、学科组织框架内的中西人才交流、学术研究思想方面的中西观点交流、实验研究中的中西研究设备交流等，为中西方优质学科建设经验的交汇与共生提供平台、创造条件。

### （三）公共核心指标的特化

所谓公共核心指标特化，就是把西方一流学科话语中的公共核心评价指标，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指标、产学研合作项目指标、重要论文引用指标、学科产出绩效指标等，置于中国学科环境中并予以再定义、再赋值、再充实，使之获得大致对等且本土味浓郁的境遇化内涵与所指。如果说一流学科评价指标有两类——一类是公共核心指标，如高水平学科团队、高层次科研成果、高科技产品等，另一类是区域性特色指标，如特色学科研究方向、特殊区域发展贡献、独特地区科研难题攻关等，那么对第一类指标的特化（即具体化），使之获得中国式的表达就成为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过去，许多学者误以为学科评价的公共核心指标完全是客观、中性、同质的，是跨国界、跨文化、跨时代的，对其照搬照抄即可，这一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完全脱离本土土壤的超级学科评价指标是不存在的。其道理很简单，在不同国家与语境中，人们对“高水平”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西方所言的“高水平学者”“顶尖级成果”在中国语境中不一定具有与西方相当的地位与一致的指涉。在拿来主义取向的误导下，我国学者经常会犯下搬用西方学科评估“空壳概念”的错误，而没有对其背后文化意蕴予以深究。诚如有学者所言：“后发国家在学习先发国家经验时，往往容易照搬外显指标，对蕴藏其中的价值伦理、文化追求等往往不闻不问，以至于仅仅搬来现代化的‘躯壳’，却没有学到现代化的真谛。”所以，在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境遇中，学科评估适用西方一流学科公共核心指标时也应该考虑中国化的调适，将之转变成为“中国特色”的内在构成后方可使用，这就是学科公共核心指标的特化环节。例如在西方一流学科评价中，学科

领衔者可以是不承担任何教学工作的专业研究者，而在我国立德树人、育人优先的中国特色学科建设框架中则可以作如下转换：一流学科的领衔者须具有立德树人精神且承担年轻学者或大学生的指导培养任务。再如在全面协调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对一流学科的评估绝不能像西方那样过分重视学术声誉、毕业生声誉、论文引用率等硬性学科水平指标，而要将学科水平评价与学科结构、学科治理、学科环境等因素综合起来判断，尤其是要将学科团队建设、学科生态培育、学科长效发展机制建设等置于重要地位，以全面评判每个学科的实力、潜力、内生力与影响力等。因之，在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的大系统中去重新定义、灵活特化西方学科评价指标的指涉与内涵，让抽象评价指标在中国境脉中意义重生、内涵再构，是从根本上防治一流学科建设西方化的一剂良药。

作者：龙宝新，教授、博导，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学副院长，从事教育基本原理、教师教育学研究。

引用本文：龙宝新. 论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J]. 高校教育管理, 2020, 14(3): 1-8.